缅怀追思

立德立言写人生
——纪念鸿彬先生辞世一周年

李治亭

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、《清史研究》前主编、享誉学术界的清史专家李鸿彬先生归道山已经一年了。作为至近的朋友，我为他过早地离去而悲痛不已，心中的怀念绵绵无尽，每每忆及他的高尚人格和为我国清史研究所付出的巨大劳绩，不禁充满了崇敬。他以立德立言写出了他的光彩夺目的人生，为我们树立了一代学者的典范。

一、谦虚谨慎，老老实实做人

《春秋》云：人生有三立，即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人一生中，若能立其一，已属不易，若得两立，其难可知，就更不用说“三立”了。以“三立”而观鸿彬，我以为他已达到了两立之境界：一则“立德”，已显其德超凡脱俗，出类拔萃；一则“立言”，为学术立一家之言，已见其学术之成功。鸿彬一生努力实践做人的准则，如一谦谦君子，谦虚谨慎，讲信誉，示忠诚，老老实实做人，使他的人生现出夺目的光彩。我在同鸿彬的 20 余年的学术交往中，逐渐认识了他。

1978 年夏，我们相识于沈阳的一次学术研讨会，恰巧又分到了一个小组。他发言评价努尔哈赤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他那朴素无华的外表，穿一件的确良半袖衬衫，略显得旧些，却是干干净净，连一点褶也看不出来。他戴一副醒目的大眼镜，尤其是头发梳理得异常整齐，以后一直是这样，从没发现头发有乱的时候。他爱清洁，注意仪表，也仅止于整洁而已。记得他的气色特好，满面红光，笑容可掬，让人感到亲切。他讲话没有激昂的情绪，也没有妙语连珠的语言，而是以平和的语气，很有分寸地阐述他的观点。的确，鸿彬具有学者的高雅气质，绅士的风度。我初涉清史，为之倾倒。

晚上，我抱着求师求教的心情，叩响了他住处的门。鸿彬谦和有加，又是让坐，又是忙着泡茶，客客气气中洋溢着真诚与热情，倒使我感到不好意思。当我们谈起努尔哈赤的评价，他的态度严肃起来，如同给学生上课，一丝不苟，尽把他的想法一吐为快。我们就这样认识了，并很快成为朋友，约定在我进京时，一定到他家中做客。不久，我因公进京，真的践约登门拜访。他一见到我，就像久别的老朋友，高兴得涨红了脸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久久不放。我被让进他的书房。在互致问候之后，话题自然就转到清入关前史的问题上来。他侃侃而谈，不时地从书架上拿出几种清史典籍，来证明他的说法，皆有史实根据。他毫无保留地说观点，讲史料来源，如数家珍，都提供我。我大为感动。若无真诚，谁能如鸿彬那样，连个人的“看家本领”也毫无保留地给了一个初交的人！对我来说，如久旱逢甘雨，拚力吸收。我的清史研究刚起步时，便遭逢“文革”爆发，研究工作停止，一误就是近 10 年。直到新时期开始，才恢复清史研究，亟需前辈高人指示迷津，故求师之念甚强。鸿彬长我不过几岁，但“闻道”在先，我即以师事之。他坚决不同意，只把我看成是朋友兄弟。

文人相轻，甚至妒嫉，乃学者之大忌。我所了解的鸿彬，却毫无此类传统旧习，亦无某些知识分子孤傲的人性弊病，相反，他遵循“文人相重”之道，敬重每一个人。每论及当代学人，他从不贬抑任何一个人，总说人家的长处、学术特点。即使遇到不顺心的事，从不疾言厉色，却是心气平和地诉诉苦衷而已，绝不指责别人。这就是论学术而不论人，对事不对人。他是唯学问是取，对于水平高于自己的人，从无嫉意，而是以钦佩的心情，不住地赞扬或肯定。若提到他的学术，他就脸发红，不让别人说，连连否定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比不上人家。”鸿彬澹泊名利，对于荣誉一类的虚名，泰然处之，视若可有可无，置之度外。他几次跟我说：“我们是学者，就要务实求实，凭努力做出成绩，就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不必计较。”鸿彬的这种谦让自励的精神感染了我，常以他为榜样规范自己的思想，付诸于学术实践。

舍弃个人之利，助人为乐，是鸿彬的又一可贵品质。还是以我个人的体验为例。应南京军区之邀，他担任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》的作者兼顾问。他以精湛的学术和忠厚为人，赢得了负责此项工作的军区领导和全体编纂人员的信赖，推为首席学术指导。他“加盟”未久，即力荐我为明清（后金）战史的撰稿人。1987年8月，南京军区“百科”编写组的领导邀鸿彬赴南京讲学，以指导编写工作。他又力荐我讲述明清战争史。我与我的老师孙文良教授合作撰写的《明清战争史略》刚出版，虽说做了些研究，还谈不上深入。鸿彬早已关注明清战争，已经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，由他来讲这个问题最合适不过了。可是，他把自己的这一优长学术让给我主讲。至开会时，他还不住地鼓励，给我壮胆。友谊的力量支撑着我，使我放掉思想包袱，临场发挥得还可以，会场报以热烈掌声。会后，他以欣喜之情，满脸笑容，向我祝贺，兴奋地说：“讲得不错嘛！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讲得好，效果的确好。”他称赞我对明清战史很有研究，有理论深度。至于说到他自己，他说，发表过战史中几个战役的研究论文，对整个战争过程未及研究。我知道，鸿彬这样做，实出于谦虚，而一意成全我，助我一臂之力，自己甘愿退居次要地位。若按世俗之见，或心怀偏私，难以达到鸿彬的精神境界。鸿彬一扫世俗陋习，以清白对人生、对社会；以忠诚待人，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，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鸿彬人格的伟大。

二、呕心办刊，甘为他人铺路

办刊物（包括出版社）的编辑们常爱说一句话：“为他人做嫁衣裳”。鸿彬在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同时，兼任《清史研究》的主编与编辑，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，用他的说法是，“为他人铺路”。他主持《清史研究》10多年，直至病重才卸任，为推进我国的清史研究，为培养清史研究人才，呕心沥血，惨淡经营，付出了他的生命年华。

《清史研究》的前身，曾名《清史研究通讯》。初创时，不过是打字油印的内部刊物。其实，这算不上刊物。一年中不定期出刊，每期不过万余字左右，刊登清史研究动态、信息，只供内部资料交换，没有多少人注意它。鸿彬就是在一无资金、二缺人手的极难的情况下，接受所领导的委派，参与创办并主持编辑工作。随着清史研究屡掀热潮，蓬勃发展，创办一个正式刊物已成为迫切需要。鸿彬为之积极奔走、呼吁，在数年之后，终将内刊变为公开发行的期刊，油印变铅印，原先仅登动态、信息类内容，又一变而为论文。后将“通讯”两字去掉，再变为《清史研究》。此刊的演变，是与鸿彬的艰巨努力分不开的。在编辑部，他一身数任，既任主编，又当编辑、编务，也搞发行。即使后来略增人员，他还得过问每件事。经费不足，始终困扰着刊物的正常运作，他多方联系，争取赞助，幸得日本方面的资助，鸿彬不敢妄花一分钱，把钱节省下来，办好刊物。

确立《清史研究》的学术地位，使之具有权威性，必吸引重要学者为刊物撰稿，必登高水平的研究成果。鸿彬广泛联系清史学者，常常亲自写信邀稿。不出几年，海内外“群贤毕至”，都来问津于《清史研究》，于是，佳作荟萃，新一代亦崭露头角。《清史研究》如一百花争妍的园地，显示了它的繁荣与昌盛。迄

今，它仍是国内独树一帜的惟一的清史专业期刊，成为培养清史新秀的基地，其影响远及港台、日美，乃至世界。《清史研究》能有今天，固然有清史所领导的支持与指导，但鸿彬参与首创之功及艰难运作的种种劳绩亦不可没。进一步说，《清史研究》的创办及其发展是与李鸿彬先生的名字系在一起的。

回顾我研究清史的历程及取得的一些成绩，多得益于《清史研究》的培育和鸿彬的提携。1978年秋，我与北京的几位朋友首次赴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，考察努尔哈赤创业之地赫图阿拉，深为努尔哈赤的业绩所感动。考察后，即兴写成《新宾访古纪行》一文（后改写成《努尔哈赤创业考察记》）。到哪里发表呢？自然就想到刚创刊不久的《清史研究通讯》。实在说，这篇几千字的小文，不过是篇习作，能否发表，没什么把握，就给鸿彬写去一封信，征询意见。很快，我就接到了他的复信。他慨然应允，并鼓励我把文章尽快寄给他。我高兴极了。此文终于在《通讯》1980年第二期发表了。虽说是打字油印，也无稿酬，毕竟在北京发表了，从中所受到的激励与鼓舞，却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增添了信心和力量。

当然，我的文章并非投来即发，也有被拒绝的时候。鸿彬对每一篇文章都经过认真筛选，不勉强，不凑合，坚持原则，以保证质量为第一。大约是85年左右，我针对个别学者的观点，写了一篇《清史纪元始于何年》的争论文章。鸿彬担心由此引发争论，刚创办不久的《清史研究通讯》不易承受，便委婉劝阻，我理解他的心情，不能难为朋友，就把稿子撤了回来。吴三桂是个有争议的人物。88年前后，《北方论丛》展开了论战。我也写了一篇《历史的回答》，拟参加论争。我即建议鸿彬应在《清史研究通讯》开辟专栏，展开讨论，如蒙同意，我将已写成的这篇论文寄上。鸿彬处事唯谨，深知吴三桂之争论太大，一经在本刊开了口子，怕是后来不好结束，因而婉言谢绝了我的建议，稿子也不能收，我就寄给《北方论丛》发表了。我重提此事，意在说明鸿彬处事，自有原则，不徇私情，一切皆为刊物着想，有利就做，否则，坚决不做，即使是朋友也不能例外。

鸿彬做主编与编辑工作，一方面把握住国家的大政方针，一方面掌握学术界的动向，直至具体学者之间的关系，他都了若指掌。但是，他对每篇稿子都一视同仁，对不宜刊用的稿子，他都向作者说明原因；可用但须修改的，也要告知如何修改。鸿彬的那股认真劲儿，着实感人。他特别关注当时正值中年的学者和新崛起的新一代年轻学者，尽可能多地发表他们的所作。鸿彬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起他的这一想法。他认为，（当时的）中年人学术已臻成熟，正是大批出成果的时候，刊物多发他们的成果，能反映学术界的基本动向和水平。他还认为，刊物的一个重要职能，就是发现人才、培养人才。发表一篇文章，可能是其事业的起点或转折点，其激励作用是巨大的；如随意否定一篇稿子，可能给他们是一次打击，这对青年学者尤其不利。所以，他郑重表示：熟人甚至是朋友的稿子不能忽视，但不能来稿即用，发不了，要作说明，但对首次投稿的新人包括青年学者的稿子尤其不能忽视，尽最大可能给予扶持。生活已做了证明，他就是按此原则办刊，刊物是越办越好，而他也赢得了清史学界和更多的朋友的信赖和爱戴。

鸿彬把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刊物，内心充满了诸多苦衷。每当我们见面时，他必谈刊物的盛况和他的计划与打算，从言语及表情，都洋溢着成功的喜悦。但一谈到我个人的研究情况，他不免发出感叹：“我真羡慕你！我这样下去，什么著作也写不出来了，连写论文的功夫也不够了。”那时，他还没患病，已准备好了足够的史料，拟写《清代军事史》、《清朝开国史》（可能还有别的计划，记不清了），就是没有时间写！他几度想辞去主编，所领导不同意，劝他留任，学术界的朋友也不希望他辞。他几度苦笑，显得无奈。但他最后只好安慰自己，说：“我就在这块园地当个园丁、筑路工，给清史研究铺路吧！”

三、潜心治学，自成一家之言

鸿彬教书育人，可“为人师表”；主持编刊，甘为学人铺路。他潜心治学，自成一家之言，在我国清史尤其是清前史研究领域确立了

自己的学术地位。

鸿彬学术，主要集中在清史、满族史、军事史等领域。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前，我不能道其详，自新时期开始，我却知他倾注很大精力于清前史研究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。

鸿彬治学，一向以严谨著称。这源于他对历史科学的深切感悟，又源于他的求真求实的品性。他热爱自己的事业，达到虔诚而痴迷的境界，刻苦用功，不舍昼夜，对所研究的问题必求得完满的答案，否则，绝不轻易发表看法。他对清入关前的满族社会性质、清（后金）政权封建化的过程、明清战争，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等，都做了深入的研究，有所发现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创见。例如，关于努尔哈赤之死，历来说法是，因攻宁远（辽宁兴城）时被炮击成重伤致死。鸿彬以新的史料考证，指出“炮伤说”，是根据朝鲜人李星龄著《春坡堂日月录》误记而传下来的错误说法，正确的结论是，努尔哈赤死于“毒疽”。他将这一发现，写成《努尔哈赤之死》，发表于1980年二期《社会科学战线》。他的《满族祖籍小考》，于1985年发表在《学习与探索》二期。此文论证努尔哈赤的祖先原居黑龙江北岸，科学地解释了努尔哈赤祖先的由来。鸿彬对明清战争的深入研究，在他的关于大凌河之役、征朝鲜之役、锦州决战、山海关大战的系列论文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。这些文章皆以考证细密、论证准确而取胜。

鸿彬的清入关前史的学术思想，集中地反映在他的学术专著《清朝开国史略》（齐鲁书社，1999年。以下简称《史略》）一书中。可以认为，此书是他的清前史学术思想的集大成，自成一家之言，这使他成为国内清史研究主要是清前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。

《史略》论部头不大，只有20万字。我们评价一部著作，绝不可以部头大小、文字多少来衡量，重要的是它所达到的水平。《史略》的特色，就是简而不漏，要而不繁，紧紧抓住了清入关前史的基本线索，也就是最基本的问题，以详略得当的方法，对每个基本问题都做了论证，清晰地勾勒出清从崛起创业到入关的数十年的历史进程。且不说观点，就以引用史料之多为例，足以使人惊叹。如，第一章“满族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内的历史发展”，共34页，文字为2.5万余字，其注释为174条，占去9页，几达正文的三分之一。注释文字小而排列密集，如放大如正文，恐怕其字数就会等量齐观了。第五章“皇太极嗣位与改革措施”，约4万字，注释为208条，亦即参考了200余种史籍。《史略》正文阐述与史料注释兼考辩并重，是迄今一般著作无法企及的！广引各种典籍，实际是开列了清史的必读之书，足够初学者按图索骥，起到了引导读书的作用；而对于研究者来说，适足以提供重要参考。我读《史略》，对此感受最深，为其读书之多、治学之严而折服。研究清前史，不管以多少文字，就是回答一个问题：清何以兴（包括满族何以形成），明何以亡。《史略》以简洁明快的语言，合乎情，顺乎理，做出了科学的回答。鸿彬在书中所表述的一系列观点和结论，受文字限制，不便逐一征引，仅指出的是，他做到了是非、功过皆分清，并深入分析其原因，对每个问题都给予一个完满的答案。我以为，《史略》应列为清前史研究的一个最好的读本。

清前史是清史的重要组成部份。因为它是全部清史的“源头”，因而更显得重要。在改革开放前，数十年间，严格地说，清前史研究还不成其为体系，尤其受传统观念的束缚，还不能正确认识和解释清前史。新时期以来，清前史已成为清史研究的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，鸿彬是新时期清前史园地开拓最早、成就最显著的学者之一；他在满族史、清代军事史的研究领域，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，这使他成为我国清史学界一位深具影响的重要学者。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及其学术思想、做人与治学的精神，是他留给清史学界的一份珍贵遗产。随着岁月的推移，必将愈加显示其重大的科学价值！

死生有命，规律难违。鸿彬以有限的生命，立德立言，建功建业，已回报给祖国，回报给社会。应该说，鸿彬不虚此生。他的名字将永远同我国的清史研究事业联系在一起，长久地活在代代清史研究者的心中！